



□ 陈秀红

# 马来西亚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在195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排名靠前，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1970年，政府制定实施新经济政策，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依赖初级产品转向制造业。1977年，从低收入国家跨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至40年后的2017年，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1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高位而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人均12055美元的下限。究其根本，马来西亚到底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什么因素制约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只有拨开“陷阱”的团团迷雾，才能获得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有益启示。

## 高端技术人力资源短缺，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初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来发展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最大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后来又受到来自国外企业竞争的冲击，而且随着欧美国家进口需求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最终导致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由此进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但却面临着重重困难，比如人才流失严重。教育发展质量较低，使得国内高端技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阻碍了创新能力提升，导致大部分企业始终徘徊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马来西亚有大约150万左右的人口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国外，达到了总人口的5.3%，他们基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高等教育供需失衡，产学严重脱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人才的重要

性，开始大规模投资高等教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278.8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4%，占总人口的16%。但是，2011年却有近230万个高技能职位空缺，由此，出现了高技能人才岗位空缺与大量高等教育毕业生失业并存的尴尬局面。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能力非常薄弱，研发经费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64%，远低于亚洲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投入，获得的专利数量更是远低于同时期的新加坡和韩国。高端技术人才的匮乏、低水平的研发能力无法为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 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转型内生动力不足

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来看，在经济发展初期，投资会拉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随后当经济发展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明显减弱。紧接着，扩大内需就会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突破口。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动力大致会经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比如韩国，1970年投资率为25.4%，消费率为94.6%；1990年投资率上升到37.5%，消费率下降到75.4%；2010年投资率下降到29.2%，消费率上升到83.5%。马来西亚在2000—2010年间的消费率大约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消费率水平偏低，经济增长动力模式未能成功迈入消费主导型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严重的贫富分化不仅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加大社会治理成本，而且还使得中产阶层难以发展壮大。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增加要远大于收入的增加，其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贫富差距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使马来西亚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充足的内生动力。

## 过快的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初期，纷纷推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工业化的蓬勃发展极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马来西亚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速度。1970年，城市人口比重为33.5%，1990年达到49.8%，比1970年提高了16.3个百分点；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比重达到72.2%，比1990年提高了22.4个百分点；2018年，城市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已超过76%，成为东南亚除新加坡、文莱以外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属于“后发性”城市化，是一种“追赶”性质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依赖于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变，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短期剧变。剧变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配套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同步跟上，同时也出现了交通、环境、贫困、暴力犯罪等社会治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势必依赖于充足的经济资源作保障，这样就形成一种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争夺资源的局面，最终结果就是阻碍了本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西方国家200年甚至更长时间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到50年的时间里都涌现出来了。在非常紧凑的时间框架里塞入所有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秩序混乱和功能失调。”

## 腐败问题和族群政治文化凸显，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马来西亚从国家独立直至1969年大选之前实行的是民主政体，但在同年族群冲突事件发生后，开始加强了议会选举活动、经济事务和社会

事务的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后，开始出现大量的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秩序遭到破坏，严重制约了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马来西亚政治权力渗透到了经济社会各领域，权力泛化滥用的问题较为突出，且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官员腐败掠夺着公共财富，损害着公共利益。权力变成重要的经济要素流入市场，不公平竞争现象越来越凸显，直接恶化了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严重妨碍了私人资本的增长。另外，马来西亚属于多民族国家，主要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且信仰不同宗教。马来西亚政治文化深受种族文化和族群主义影响，族群主义优先考虑本族群利益诉求，将自身族群利益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不利于营造民主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临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了进行经济改革的紧迫性，于2010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模式”，提出了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新经济模式”的关键是实现经济转型，即产业上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提高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提高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比例；经济结构上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经济模式”实施至今，取得了一定效果，尤其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效果较为明显。但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并未进行深入的改革，腐败问题依然突出，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文化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要素投入而非生产率的提高，产业仍集中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高技能劳动力依然紧缺。所以，马来西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反应速度与应对强度，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

## 抗疫有力的大国典范

流行病的出现、传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科学真理的角度来看，流行病的暴发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不确定性以及无差别性。流行病是需要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的公共问题。

从抗疫初期到取得重大阶段性抗疫胜利的过程，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领导能力与规模治理的巨大优势，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和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我国独特的治理模式充分地转化为疫情防控的高效治理能力，与其他和我国相似体量的大国相比，成效与绩效都极为突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对我国应对疫情的治理表现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疾病控制需要在科学逻辑中进行推进。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我国秉持科学精神和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全过程。从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的总结与介绍、中西医药物结合治疗办法的尝试与推广、方舱医院模式的复制与推介以及在民众流动追踪管理、检测方案的大胆创新等方面，都鲜明体现出我国科技大国、创新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抗疫有力的大国典范。

## 做好后疫情时代国际形象话语权的构建

**精心设置议题。**首先，借助科研力量及时开展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形象调查评估研究，形成外交研判基础。其次，组织海内外相关外交、科研、慈善机构，围绕3个方面进行议题开发：一是疫情的全球挑战与国际社会的未来出路，强调全球合作与分工，防止以邻为壑的噪音。二是强化国际合作，纾困疫情冲击下的发展中国家，关注这些国家的后疫情恢复问题，展示我国务实朴实的国际形象。三是针对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公共卫生事业挑战提出改革倡议，由于目前构建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存在明显不足，需要鼓励后发国家进行合作，对短板与不足进行合理的修正，调整发达国家民众对我国优势体制模式的认知偏差。此外，尽快建立联合牵头的国际性疫情互助组织或机构，致力于与WTO及世界各国开展合作，探讨如何改进世界性流行病防控体系，从而完善全球应对相似危险的能力。

**推动话语下沉。**首先，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话语重心，应该进一步实现受众层次的下沉，使得原本让国外政要精英熟悉的话语，下沉为能够让国外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的话语。例如，不仅要展现我国之于疫情的国际责任和担当，还要强调我国在开发普通民众能够低廉、便捷使用的防疫物品方面的巨大努力，以及我国在解决疫情冲击下的就业与民众福利上的具体成果与事实表现。其次，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话语方向，应该进一步实现故事层次的下沉，将我国防疫事业有关的生动故

# 构建后疫情时代我国的国际形象话语权

□ 杨玉飞

事、感人叙事，转化为文艺产品进行传播。利用民间公共外交资源，充分发挥民间资源在故事传播与讲述中的作用。再次，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话语逻辑要改变简单的因果逻辑，防止造成国外民众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从具体的、丰富的案例材料展开话语宣传，通过复杂但有条理的事实罗列，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 and 认知我国防疫成就的原因以及基础性条件，从而降低逻辑上的跃迁性，减少认知上的负荷，让受众感受到我国在防疫中的表现，不仅说得好，而且做得比说得好，进而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美誉度。

**求取最大公约数。**首先，要寻求目标用户偏好差异的最大化。对外传播是对内宣传的延伸，但是既然是延伸，就有不同于对内宣传的特征。在对外传播中，国内公众普遍支持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国外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误解。因此，应该适当考虑目标用户群体的差异性，在差异性这一前提下，兼顾代表性、公正性。也就是说，包容和理解别国部分民众的偏见、激进以及易被利用，这应该是开展国际形象外交工作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开展工作可以借助的有利契机。其次，适当借力借势。在国际舆论体系博弈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我国一些媒体国际传播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在目标国家的落地率还没有达到预期，外国公众仍然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和认识中国。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争取别国媒介客观公正报道我国国际形象。虽然这个过程会面临诸多阻碍，但是只要足够的诚意和耐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秉持媒体的职业操守，海外媒体会不断改进他们的认知态度。最后要注意“涓流效应”，因循“流量思维”，抓住舆论权力的源头，从高影响力和传播效力的媒介展开攻势，也就是跑到媒介世界的上游，从而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流量思维”即意味着要遵守媒介工作的职业性，职业性意味着敏感性，而敏感性会催生流量价值。这样，对我国国际形象的传播扩散，才会更加切实有效，才能真正实现借助他人之手，使得我国国际形象从“他塑”为主转向“我塑”为主。



(上接1版)

### 加快绿色转型,奋力推进更可持续的发展超越

这些年，福建大力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提出的生态省战略，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优，森林覆盖率66.8%、连续40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并在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全国生态文明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一。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建擘画的生态省建设蓝图，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努力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把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保持绿色发展方向不改。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支持绿色技术

创新，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快产业园区绿色化、循环化改造，降低碳排放强度，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培育绿色消费习惯，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加快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普及计划。

保持生态福建底色不变。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争取新增一批改革创新成果向全国推广，创建美丽中国福建示范区。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保持污染防治力度不减。深入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净土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创新推广木兰溪治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扎实推进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打造八闽“幸福河”、美丽海湾、美丽海岸带，把“清新福

建”品牌擦得更亮。

### 树立底线思维,奋力推进更为安全的发展超越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工作部署，对在复杂环境下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福建区位优势特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较多，我们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